

省长道歉：民主政治的契机

◆ 曹树基

针对山西部分地区出现的“黑砖窑”事件,山西省长于幼军向受害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公开道歉,并向山西人民检讨。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部级高级官员就公共安全中的过失第一次向民众公开道歉。

在几年前发生的非典事件中,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因隐瞒疫情而被免职。可能是由于免职令下达得太快,他来不及向全国人民道歉就已下台。一段时间以后,卫生部下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心主任李某为“中国没有对去年年底开始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及时做出反应道歉”。代人受过,算不上真正的道歉。

这次不同。这次是任现职的山

西省长向受害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道歉。山西黑砖窑中“黑奴”的形成非一日两日,也非一年两年,从外地来晋上任且时间不长的于幼军,尽管有理由将责任或部分责任推到他的前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公开道歉。仅从这一点看,他的道歉是真诚的,可以看作政治清明和政治进步的表现。

然而,我们还不能据此对山西政治生态表示过分的乐观。因为,评价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是否良性,其标准应该是,政府各级部门的领导人,不仅要有人为失职而公开道歉,也要有人为失职而引咎辞职,或被免职,还要有人为失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政府官员被免职以及承担法律责任,是文官制度建设重点,而引

咎辞职,则是失职官员良心自我拷问的结果。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失职者引咎辞职,因此,我们还要等待。

站在政府的立场,有人说山西运城、临汾、晋城等地的地方官员,并不是直接的肇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充其量不过是失职,而不是犯罪;他们是失察,而不是故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站在民众的立场看,只要存在大范围的穷困,只要出现大规模的犯罪,就一定要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一个有良知的政府官员,在责任面前,必须也一定会进行深刻的自省及良心的拷问。公开道歉与引咎辞职通常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虽然责任省长已经公开道歉,但地方上的责任官员却仍在保持沉

默。这一事实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基层政治生态的恶化。展开专项治理行动,以暴制暴,追究事件责任人,可以收到一时之效,却难做到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我以为可以藉此事件推进山西的民主政治。在“黑心产业”的集中地,进行民主政治的试点与实践:一人一票,选举村委会主任,选举乡镇长和县长。党内民主也可以依此试行,一个党员一票,选举村委书记,选举乡镇书记和县委书记。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眼光向下,时刻惦记群众选票的基层政府和党组织,藉此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社会。这样,于幼军省长面对公众的诚恳道歉,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契机。

评论 07070111201

必须关注农村“留守家庭”

◆ 唐钧

比例 70%,算出外出的男性已婚农民工为 4700 万人,再按一夫一妻,推算出“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妻子也有 4700 万人。如果主要以农村“留守妇女”4700 万为基准,加上夫妇双方外出而造成的隔代型、空巢型、孤儿型以及男性单亲型的“留守家庭”,比较保守的计算至少也应该有 5000 万—6000 万个农村“留守家庭”。

真正的城市化、现代化是人的城市化、人的现代化。当“人”这一最重要的因素被忽略时,我们的政策

思路就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这实际上意味着,城市需要的仅仅是“外来人口”和“农民工”的强劳力,需要的是他们的青春、体力乃至血汗,而对他们的家庭的生活以及可能遇到的社会经济风险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政策是狭隘的、也是短视的,隐含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统计口径中的“城市化”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这种以“流动”和“转移”为基本特征的“城市化”,或

者从政策层面上说,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政策中,经济理性远多于人文关怀,是造成农村留守群体及其面临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关键之关键是城市要真诚地对待从农村进城的新移民”,让他们在城市的经济建设中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能够平等地分享城市社会经济成果,欢迎和接纳他们在城市中定居下来,逐渐地融入城市社会。这是解决留守问题的最根本的一点。

游学成风,真没必要

◆ 英奇

暑假快到了,新民晚报前几天报道,今年以外语夏令营、国际交流等名义的青少年境外游学活动甚是火热。我们这一代当学生时,暑假大不了是补课、玩乐,偶尔与家人到外地旅游,空闲的日子很多。今天的中小学生对不一样,有能力的家庭都送孩子一窝蜂往外跑。暑假必须游学,必须参与夏令营,暑假成了充实、润饰“个人档案袋”的好时光。

各色游学团应运而生,便宜点的到日本;富贵的就到英国剑桥(是小镇而已,不是大学)学英文,或到美国的宇航营、顶尖名校营。

若孩子明年考大学,那除了游学,就更需要工作经验了。愈来愈多中学生为了让履历多些名目,经由父母亲戚穿针引线,到一些企

业做数星期的暑期工。只不过二三十天,这些公司可以做怎样的培训?不要紧,履历求结果,不重视过程,孩子的“个人档案袋”若没有一两项可炫耀的,怎么行?

问题是孩子忙了整个学年,到暑假都不能喘口气,他们仍是可怜的小填鸭。有多少年轻人能通过短短的,有人带队的游学团认识当地文化,开阔视野?再者,“个人档案袋”需要建筑在金钱之上,那么何种“历练”才是必须?假若有父母喜欢研究昆虫,暑假来了,孩子不游学,整个夏天跟着父母在大自然跑,寻找昆虫,制作标本,这样提升大自然情怀的活动能否加进“个人档案袋”?当然,最惨的是弱势家庭,他们的暑期活动只能找些免费的。久而久之,他们会不会是学生之中最“落后”的一群?

啥时都能喝上“新国标水”

◆ 文馨

国家标准委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于今年 7 月 1 日实施。北京市的自来水,提前 5 年,率先在全国供水行业,达到自来水新国标规定的 106 项指标,可直接饮用。

按大多数人理解,只要达到国家标准的的水,都是可以放心饮用的。但现实不是这么回事,很多地方的饮用水虽达到“国标”,却依然不干净。复旦大学的俞佩昌教授就曾介绍,一些含有大量有机化合物且可能导致癌症的水,人喝下去“肚子里都可开化工厂”的水,却能符合国标。据了解,我国原来的饮用水国家标准是 20 多年前制定的,监测项目只有浑浊度、大肠菌群等 35 项,只要达到这 35 项指

标,即使水中含有大量病菌、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也能达标。我国越来越多的水生疾病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与陈旧的饮用水卫生标准有关。正因如此,国内许多专家呼吁修改国标。

但新闻中的“提前 5 年”与“率先”等关键词提醒我,想喝上“北京市”的路还挺遥远。报道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投入巨资,采用国内外领先的给水技术,确保了出厂水指标优于国家标准。我注意到,国内许多省市实现新国标的节点,几乎都是 2010 年以后。就是说,虽然实施了新国标,但除了北京人,大多数人和我一样,近几年内还喝不上新国标水,还要等下去。



“公共文化”怎样服务老百姓

◆ 孙晓忠

近来公共文化服务成为热门话题,当今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让我们感到社会道德正在滑坡,乡村文化环境日趋恶劣,受发达国家重视文化的启示,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文化作为未来世界的软竞争力,对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于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自然摆上了议事日程。

为老百姓花点钱,这当然是好事,将政府的功能理解为服务型政府,重视公民的文化权利,对中国来说是一大进步。当然也依然有人不同意由政府来主导文化建设,这些人一谈到文化建设,就试图将文化产业化,总是在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层面来谈文化建设,认为只要抓住市民的趣味,一切文化由市场自生自灭,结果我们今天电视剧不是帝王将相,就是“东邪西毒”,殊不知市民的“趣味”其实是被慢慢“培养”出来的,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首先有什么样的文化,才会有什么样的“趣味”。

也有不少政府官员将文化建设理解得过于简单。如今各省市厚厚的

文化发展规划中,总是将建设多少“文化广场”等形象工程大书几笔以显示政绩。不是说盖几个图书馆,建几座大剧院,或演几场“图兰朵”,公共文化就服务到位了,文化之所以被看成是未来世界的“软竞争力”,难就难在这个“软”字,它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也不可能仅仅依靠硬件设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为了搞文化服务网络,在农村搞“三级网络”,建乡镇图书室,我们以前建得少吗?但是为什么多数图书室门庭冷落,成为摆设?再譬如说吧,作为文化建设的主导者,如果我们将眼光停留在同发达国家“竞争”的理念上来搞文化建设,也大有问题。既然强调文化多元,就不要总是跟着别人的屁股跑,而应该跳出竞争的发展思路,重新开辟出别样的生活方式。让每个国民感觉生活得既有意义,又心安理得,这才是文化建设之根本。就一个国家内部来说,总是比竞争,比速度也不是好事。就拿刚刚结束的又一轮高考、中考来说,如果不跳开竞争的逻辑,如果不在制度层面遏止恶性竞争,我们的孩子也不

会响应中央的“全民健身”号召,从容地去操场跳“华尔兹”吧!这也是素质教育为何总是没有成效的原因。如果总是在竞争的意义上塑造“国民性”,即使取消了高考,家长们又会拼“素质教育”,比谁家的孩子更会“弹钢琴”。这样的文化生活,孩子们欢迎么?

因此如何利用文化来组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何建设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不感觉隔膜的公共文化网络,并在文化中注入我们的主导价值,让文化真正渗透到民众生活世界,这个问题很重要。让百姓听交响乐,或看马戏,重视“公民”的文化参与,都很好,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思考:一个健康的文化服务网络,应该不满足于百姓哼几句京曲、旧戏,而是让国民在文化参与中体现他的主体性,这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宗旨。这个主体性具体表现为将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结合到一起,而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但是这个独特的传统如今正逐渐被遗忘乃至抛弃,在今天,有重提的必要。

香港的强项是什么

◆ 刘创楚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香港的强项是航运、金融和贸易,又说这些优势不可能被内地城市替代。要明了此话深义,我们必须做功课,尤其要认识香港在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扮演的角色。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香港的命运已绑上了内地发展的战车,但香港首先必须对内地的发展有用。已往的经验是,香港对内地的制度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有用。

具体的制度的作用是香港人走进内地,然后从下面上发生影响的。最早的例子是香港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合作,由港人投资酒店、公路、电厂。大家签合同,由港人经营一段时期,例如二十年,然后交给当地政府,公路及电厂又列明回报率。此制度令内地的基建可以立即上马,和此制度大同小异的做法令内地迅速工业化,至少在改革开放初十五年,港人在内地的制度现代化上有功。到了内地于 1993 年制订《公司法》,跨国公司争相进入内地,港人的制度影响力才告一阶段。

但接棒而起的是香港在内地组织现代化上的作用,这靠内地企业走到香港上市。国企于 1982 年开始改革,试过承包制、厂长经理责任制等都不见有效,最后实行股份制,也难起市场监督企业的作用,因国有股始终占大。到了赴香港上市,必须受香港有关法规的监督,才逐渐和现代公司法接轨,组织现代化才打开缺口。到了近年内企上市速度加快,香港的影响才日见彰显。

160 多年来,香港已在西风秋雨、早期工业化及生活方式现代化中脱胎换骨,香港对大陆的可能贡献也只能是令大陆脱胎换骨。一个现代化的祖国大陆,才是香港命脉之所系。(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专栏作家)

—— | 文 | 化 | 观 | 察 | ——